

干部有“能”更要有“德”

□ 储 霞 张学聪

案 例

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近日发布了一则干部违纪违法案例，案例中提到的是四川天府新区万安街道韩婆岭村原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李志勇。1994年，大学毕业的李志勇怀着满腔的热情和抱负回到农村工作，在实践磨练中逐渐成长为当地的村党支部书记，并借助天府新区从“大建设”向“大发展”转型的契机，带领村民开展土地整理和新农村建设，把一个贫困村逐渐发展成为富裕村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能人型干部。作为村里发展的带头人，李志勇本该再接再厉、继续奋发有为，却在2022年因收受红包礼金、受贿、挪用资金而被开除党籍、银铛入狱。2015年3月，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、一汽董事长徐建一、中石油总经理廖永远、福建省副省长徐钢，均因腐败相继落马。令人关注的是，他们都曾经热情似火、才华横溢，都曾经壮志满怀、业绩不凡，但也都因为“德”的失守而人生尽毁。

从上述案例中不难看出，无论是李志勇，还是仇和、徐建一、廖永远、徐钢，他们的问题都不是出在才能上，而是出在德行上，反映了德与才的严重错位。在德才关系中，“德”是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，“才”是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。对于干部而言，德与才是互为条件、辩证统一、缺一不可的。有德无才者难堪大任，有才无德者必生祸患，二者不能偏废，不能割裂，更不能对立。德才只有兼备，才能完成责任与使命。然而，德才兼备并不意味着德才在地位和作用上的完全同等，在才能具备的前提下，德往往更加重要，因为德关系到才的价值和意义，所谓“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”。政治品质不好、道德品行不高的人，才干越强、职位越高，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危害越大。正是因为“德”的更加重要，我们党在党章这一根本大法中将干部的选用标准确立为“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”。

德是干部的立身之本、从政之基。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古人所讲的“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就是把德放在首位。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，格外看重干部的德。早在战争年代，毛泽东就提出党的干部必须“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有政治远见，有工作能力，富于牺牲精神，能独立解决问题，在困难中不动摇，忠心耿耿地为民族、为阶级、为党而工作”。改革开放以后，邓小平将我们党在战争年代总结形成的德才兼备干部标准具体化，指明“所谓德，最主要的，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”，并将德确立为干部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的前提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伴随全面从严治党道路的深入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的政德，要求“明大德、守公德、严私德”，为干部政德赋予了新时代的内涵意义。其中的明大德，集中指向于党的理想信念，是德的至高；守公德，集中指向于党的宗旨意识，是德的核心；严私德，集中指向于干部的严以律己，是德的基础。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要

求、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，干部必须具有对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忠诚的政治品格，求真务实、勇于创新的政治气魄，廉洁用权、公道正派的政治操守，精益求精、甘于奉献的政治境界。只有这样，干部才能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坦荡做人，保持公仆本色，才能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大展宏图，大放光彩。

党和人民的事业是一个长远发展的事业，需要大量有才华、有能力的干部组织团结人民群众齐心协力、共同奋斗。干部才能是成就伟大事业的必要条件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者、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带头人，干部如果没有与事业发展要求相匹配的能力和水平，推动和发展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一句空话。因此，我们党非常重视对干部的能力培养，通过干部院校培训和实践锻炼，为干部增长才干创造条件，为干部能干事、成事提供组织支持。许多干部也很重视自己的能力学习，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在组织搭建的平台上汲取知识营养，提升工作能力，展现个人才华。但是，“能”终究不能替代“德”，如果少了对“德”的培养教育，少了“德”的自我修养，干部的“能”很容易偏离正确轨道，滑向个人主义和腐败的泥潭，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。案例中的李志勇、仇和、徐建一、廖永远、徐钢，都是能力很强的干部，有见识、有魄力、有才干、有水平，他们用胆识谋略创下了骄人的成绩，但也逐渐轻视和放松了对自身“德”的要求，终因“能”有余而“德”不足，最终丧失了做人做官的原则与底线，走向党和人民利益的反面，曾经的一切努力不仅归零，甚至成为人生负数。鉴于此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

视干部的教育与管理，尤其重视干部德的教育和管理，要求干部培训把政治理论放在第一位，干部选拔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，干部能力提升把政治能力放在第一位，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，确保干部德配其位，才配其位。

德的自我约束性决定了广大干部的内在主动修养更为重要，而这种修养不是短期的阶段性的，是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，是干部的终身课题。在终身修养中，干部必须认识和处理好三个关系。一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。做官先做人，做人先立德。没有端正的人品作支撑，使用权力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只有坚守做人的道德，才能以人格的力量支撑起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政治操守，以人格的信念铸就共产党人一贯秉承的道德准则，以人格的魅力展现共产党人一贯追求的从政价值。二是权力与权位的关系。权力就是责任，权位就是承担责任的平台。对于每一个干部来说，拥有权力和权位，就意味着获得了服务人民、贡献才智的机会。只有格外珍惜和充分把握党和人民给予的机会，才智的贡献才能转化为党和人民所需要的财富。如果把权力当成谋私的工具而滥用权力，把权位当成攀附的阶梯，权力的人民属性就会变质，掌握权力的人就会失去正义，权位就会成为拉帮结派的集聚地，干部的才智就会成为腐败的助推器。三是勤政和廉政的关系。勤者，政之所需；廉者，政之本也。勤政和廉政，如车之双轮、鸟之两翼，不可缺少。勤政为民是干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根本体现，廉洁奉公是干部取信于民的重要基础。勤而不廉害人害己，廉而不勤误国误民。只有坚持既廉又勤，且勤而有效，才能保持干部清正的本色，也才能守住干部为民的本分，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。



(上接1版二条) 必须坚持规划引领、政府引导，深化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，挖掘生态资源特色和文旅资源优势，围绕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、培育乡村特色产业集群强化政策支持，推动农业与工业、物流、休闲旅游、信息技术服务等多元化业态深度融合，通过碳排放交易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机制推动生态资源“变现”，有效延长产业链、提升价值链，把更多收益留给农民，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。

顺应大数据智能化变革新趋势，注重发挥数字化全面赋能乡村建设作用。数字经济将数据要素转化为数据产品并赋予使用价值，与农民生活、农业生产、农村政务相结合，改造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，促进了乡村人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农村通信设施从无到有，逐步建立起信息组织体系和技术依托网络，并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现代化农业迈入信息化时代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5G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形态，农村电商、直播带货、流量经济等新业态活力迸发，无人机、数字化监测系统等工具日益成为农民手中的“新农具”。实现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，必须抢抓数字化变革重大机遇，以数字化创新发展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、要素配置、产业发展、公共服务和生态环保治理相互融合发展。从顶层谋划数字乡村建设，组织实施乡村数字新基建项目，推动巩固脱贫、农资监管、农产品流通、集体经济监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场景

建设，鼓励探索农业生产智能转型、乡村经营链上增值、乡村治理智慧创新等新模式，撬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各领域系统性重塑。

顺应农村全面实现脱贫新变化，注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。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，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、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大步。脱贫摘帽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活、新奋斗的起点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、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为减缓贫困奠定了基础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农村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，农民收入大幅提高，温饱问题逐步得以解决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把精准扶贫事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，对贫困问题作出了符合当下实际的科学判断，提出了扶贫开发重要思想，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，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。更好满足乡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，必须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，缩小城乡之间、不同区域乡村之间以及乡村内部差距。注重培育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，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做大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，支持财政资金以股权方式注入，引导和鼓励农户以农地、农房、农园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股

份合作经营或资产托管服务，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模式，推进零散资源要素的有机整合，实现村内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和集约化利用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，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。

顺应农村群众精神文化新需求，注重推动乡村文化传承保护与挖掘利用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、德化人心、凝聚人心的工作。物质水平是文化变化、创新以及发展的基础，随着物质条件的大幅改善，乡村群众对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迫切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国通过实施在农村扫除文盲、构建覆盖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加快乡村文化设施建设，推进文化信息共享、农家书屋和农村电影放映等工程，农村落后文化事业得以快速发展并取得积极进展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推动农耕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把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，为建设农业强国注入精神力量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，既要“富口袋”也要“富脑袋”，不仅美在外形还要铸魂提质。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，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抓手、平台和载体，尊重乡村历史文化传统、尊重乡村自然生态资源、尊重村民生活习俗传承，保护好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，重新认识和挖掘乡村价值，激发乡土文化资源，继承发扬优秀乡村文化，创造更具有时代生命力的乡村文化。

顺应乡村社会结构变化新挑战，注重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乡村现代治理体系。农民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原动力，通过完善基层组织功能以及发挥农民主体地位，能够为广大农村、农民提供更加优质服务，从而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、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乡村管理模式，我国乡村形成了“支部建在生产单位”的方式，实现了党组织在乡村的全覆盖，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，催生出党领导下的“乡政村治”治理模式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乡村社会组织形态与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作用更加突出，不少地区通过党员志愿服务驿站、家风广场、“群众说事”等新形式，有效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。实现乡村有效治理，必须从治理理念、治理主体、治理体系、治理方式协同发力、系统推进，不断创新治理理念、方式和手段。紧紧抓住党建引领这个“牛鼻子”，把党支部作为乡村治理的“主心骨”，把党员作为乡村治理的“主力军”，调动社会资源和市场力量，打造具备适应和引领现代化能力的新时代变革型组织，支持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治理路径，推广“志愿者+信用赋分”、基层权责清单、“三治结合”等治理新模式，实现乡村社会之“和”、农民精神之“美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，重庆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、院长)

心态浮躁则作风漂、状态躁则工作粗，只有知责图进、知足平和，事业发展才能稳步向前。能否保持理性平和心态，是年轻干部成长成才路上的重要考验。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年轻干部要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，“要立志做大事，不要立志做大官，保持平和心态，看淡个人进退得失，心无旁骛努力工作，为党和人民做事”。在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叮嘱，“不要有大干快上的冲动，也就是不能不按规律办事，急功近利、急于出成绩。要把这种浮躁心理、急躁心态都压下来，扎扎实实、脚踏实地搞现代化建设”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，为新时代年轻干部队伍心态培育和健康成长指明了发展方向。

精金百炼良驹千里，以更宽的胸襟看待“位”与“为”。位从为来，“有为”是“有位”的前提条件，但不能让“有位”成为“有为”的追逐目标。一旦政绩观扭曲，必然会在权力欲望、短期利益的驱使下追求表面之“为”。例如：重眼前轻长远，造盆景刷眼球，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；重显绩轻潜绩，追求排名位次，贪一时功图一时名；重对上轻对下，不负责不担当，不是拎着“乌纱帽”为民办事，而是捂着“乌纱帽”为己做官；重升迁轻事业，醉心于留名邀官的小格局，忽视了一域发展的大事业。最终在一味求快谋提拔的心理支配下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“走关系”“找门道”上，丧失了底线原则。年轻干部只有放下“名利包袱”才能轻装上阵，杜绝博眼球式的创新、力戒口号式的表达、摒弃包装式的落实，才能真心实意为民办好事办实事。同时，“有位”是“有为”的一种结果，但“有为”并不能以是否“有位”来衡量。“事如芳草春长在，人似浮云影不留”，决定人生价值的，从来不是职位的高低，而是真正能够不朽的立德、立功与立言。“我出来工作，可以有两种态度。一个是做官，一个是做点工作。我想，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，既然当了，就不能够做官，不能够有私心杂念，不能够有别的选择。”这是邓小平坚定不变信念，在历史关头能够顶住压力推动变革。“我是一名科技人员，不是什么大官”，这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主动选择，从院长改任副院长，就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。这也启示我们的年轻干部，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在“为谁创造政绩”、“创造什么样的政绩”和“怎样创造政绩”等问题上端正态度，以真抓实干干之“为”争取为民谋利之“位”。

黄河九曲泰华三峰，以更远的眼光看待“得”与“失”。人生之路并非直线向前，年轻干部的历史成长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，一旦得失心过重，难免让心态在权衡利弊、斤斤计较、盲目攀比中更加焦虑，甚至走向自我否定的境地。有的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，希望组织马上看见并提拔重用，否则就感觉怀才不遇整日郁郁寡欢，最后自我放弃摆挑

(上接1版头条)

挖掘人口红利潜力和开启人才红利。如果仅看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，中国似乎难再形成庞大的新成长劳动力，但是，农业剩余劳动力和非农产业中生产率较低领域劳动力的转移，仍可释放出新的非农劳动力供给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旨在挖掘人口红利潜力的改革，可以创造出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。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，应该着眼于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，增强改革激励相容，进而加快进度和加大力度。此外，为了培育人力资本这一可持续要素，以人才红利支撑高质量发展，应该利用2035年之前青少年人口占比下降、公共教育经费较快增长这一时间窗口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、提高教育质量和均等化水平。

促进人口发展质量与人民生

年轻干部出保持好状态心态

□ 王 琼

子；有的遇到一点磕绊就怨天尤人，认为是领导刻意打压“穿小鞋”，以至于心理扭曲自我“边缘化”，成了负能量传播中心；有的不能容人短、不能见人长，看到别人升得高提得快就心态崩溃，在嫉妒心理支配下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。人生的得与失、成长的快与慢，从来不是因一时一事而能够给出诠释的。我们既要正确看待个人作为、岗位匹配、组织认可之间的辩证关系，把暂时的“失意”当作考验，把短期的“失落”看作磨砺，相信组织会公正地对待干部、公平地评价干部、公正地使用干部，主动提升能力素质、涵养境界情怀、扛起责任担当，作出经得起组织考核、人民检验的业绩。更要正确看待短期利弊与长期福祸之间的关系，人生是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，任何得与失、成与败、福与祸都要拉长时间维度去感悟。不坠青云之志才能压倒“躺平”之害，常怀感恩之心必能克服“内卷”之困，积极进取方能终结“摆烂”之态，以肩负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担当、涵养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胸襟，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前途和时代大势，不断实现个人境界的升华。



活品质同步提高。人口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品质之间的一致性关系，既符合现实逻辑，也具有政策含义。一方面，两者反映出相同的内涵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反映生活品质的人类发展指数，包括人均GDP、教育和健康三个板块，均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完全相同。另一方面，所有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举措，同样具有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效果。事实上，瑞典等国家的福利国家建设实践，初衷就是应对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停滞危机。最新研究表明，在人类发展和性别平等都达到极高水平的条件下，生育率会产生反弹的趋势。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，保持适度生育水平的政策举措，完全可以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统一起来。
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)